

萧易：禁酒令成为中共一场政治实验



禁酒令的极端化执行对多个行业的衰退更是推波助澜。首当其冲的就是高度依赖体制内消费的白酒行业，尤其是高端白酒。作为中国官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，飞天茅台批发价跌破2,000元（人民币）、市值蒸发数千亿元。图为中国贵州省一个白酒品牌茅台酒专卖店。（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）

更新 2025-06-29 7:35 AM 人气 47

标签：禁酒令，制度性社会治理，重创，白酒行业，餐饮行业，旅游业，社会控制，骑虎难下

【大纪元2025年06月29日讯】2025年5月，中共发布号称“史上最严”禁酒令，明确公务活动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，不得提供香烟，不上酒。招商引资等特殊场合需“一事一审批”并报纪委备案。此举从表面上看是对公款吃喝、铺张浪费的整治。然而，禁酒令在执行过程中迅速异化为一场政治运动。在当局高压推行与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下，一纸禁令演变为对体制内人员的全面管控。公务员工作、聚餐和社交活动都被纳入管理，连下班后的私人行为都需向组织交代。禁令还波及非体制内群体，导致本就风雨飘摇的中国经济和地方财政进一步恶化，加剧了社会信任危机。

从“禁酒”到“禁人”的政策“大跃进”

这并非中共首次整治吃喝行为。早在2012年底，中共就曾推出“中央八项规定”，针对公款消费、“三公”浪费展开整治，试图通过限制高档酒水、豪华宴请等官场行为，来打击山头文化、整顿地方势力，巩固中央集权。然而，各地对于这次新禁酒令的执行，将这一政策推向极端。

不但从限制“高档酒水”升级为全面禁酒，覆盖时间也从工作日扩展到下班后、周末、节假日，违者将面临警告、记过、开除等严厉处罚。更夸张的是，部分省市还试点下班酒精检测、承诺书、行为监控APP等手段，甚至连非体制内的律师群体也被纳入管控。

河南信阳事件成为本次禁酒令推出的导火索。3月22日，当地10名官员聚餐饮酒，导致1人酒精中毒死亡。舆情发酵后，涉事官员被严惩，连纪检部门也被追责。党媒《新华社》大肆报导，要求深刻认识违规吃喝问题的政治危害，反对酒局饭局、圈子文化，释放出强

烈的政治信号。

中央借此将禁酒令作为整顿风纪、树立权威的新抓手，开始大力推行。各地方政府则主动加码禁酒措施，一些地方试行“同桌连坐”、“24小时禁酒”和“饭后流动抽查”，连晚间餐饮是否三人以上都需报备。禁酒令迅速覆盖全国31省市，涉及体制内人员超过5,000万。

禁酒令的执行过程呈现出典型政治运动特征：缺乏明确边界、层层加码、形式主义泛滥，衍生出一系列荒诞现象。比如，武汉某国企禁止不同部门员工在公司食堂共同就餐；安徽某干部吃火锅被举报“疑似违规聚餐”遭罚款；上海某国企试点吹气检测，酒精含量超0.02%即扣奖金。

基层公务员在社交场合人人自危，害怕被偷拍、举报，同事间的正常交往被污名化。“禁人而非禁酒”的治理逻辑导致政策全面失控、信任危机蔓延。这种从工作场所到私人生活的全面管控，体现出当局对“忠诚度”的极端追求，却忽略了对社会经济与民生带来的冲击。

经济影响：多行业遭受冲击、地方财政进一步恶化

中国经济2022年以来本身就风雨飘摇，而禁酒令的极端化执行对多个行业的衰退更是推波助澜。首当其冲的就是高度依赖体制内消费的白酒行业，尤其是高端白酒。作为中国官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，飞天茅台批发价跌破2,000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、市值蒸发数千亿元。

自5月18日“新禁酒令”发布至今，21家白酒上市公司中九成股价下跌，其中9家跌幅超过10%。根据酒业协会统计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近六成白酒企业利润下滑，超过四成零售商面临现金流断裂风险，20家A股上市公司存货达到1683.89亿元，库存周期拉长至3.2个月。

其次是餐饮行业。由于高端宴请历来由体制内消费主导。禁酒令实施后，高端餐厅业绩暴跌，平均客流锐减43%，包桌预约退订率飙升；星级酒店包间空荡，服务员比客人还多，只好“卷地摊经济”，靠卖盒饭自救。比如，广州某五星级酒店推出“盒饭+夜啤”套餐，定价仅48元。

而中低端餐饮因此进入“连带受损”模式，街边小饭馆客流腰斩，社区型店铺关停率超35%。禁酒令还改变了消费者就餐习惯，导致行业整体收入下滑，大量员工失业。

禁酒令的“外溢效应”还蔓延至代驾、会议旅游行业。禁酒令全面禁止体制内人员的应酬需求，切断了代驾行业的主要需求来源：酒后代驾。代驾订单的锐减导致司机工作时间与收入大幅缩水，行业陷入停摆，大量司机转行送外卖。

与此同时，会议产业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样受到重创。禁酒令禁止公职人员参与非必要会议、培训，导致公职会议和商务活动需求骤减，广州、三亚、杭州等地五星级酒店会议订单被集中取消，大量高端旅游资源被闲置，整个高端旅游产业进入“休克状态”。

官方数据显示，2025年1-5月，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1.36万亿元，同比下降8.3%，其中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1,281亿元，同比下降11.9%。这表示地方财政深陷“土地财政失血”困境，急需地方增值税、消费税等收入进行补血。

白酒、餐饮和旅游等行业都是地方政府税基支柱，尤其是贵州、四川、江西等白酒重要产地，以及广州、三亚、杭州等旅游城市。禁酒令导致当地经济活力被系统性削弱，税收和就业双双大幅下滑，地方财政赤字扩大，债务偿还压力进一步加剧。

禁酒令的推行有着复杂的目的，既是政治秀，也是社会控制的手段。酒桌文化一直被视作权力寻租与山头文化的载体，在经济低迷、社会不满加剧的背景下，禁酒令成为向公众传递“节俭共渡难关”的姿态，也是当局试图缓解民间情绪的低成本手段。

禁酒令并不会触及腐败根源。酒桌仅是寻租场景之一，禁酒后宴请改茶馆、会所变民宿，权力寻租并未根除。从更深层次看，禁酒令更像是中央的集权工具，其与2012年的“习八条”一脉相承，旨在通过整顿地方势力、打击派系文化，巩固中央权威。

禁酒令执行乱象的背后，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：中央强力推行、地方推波助澜。中央的初衷是通过禁酒整肃山头文化、强化中央集权，但地方却借“防止拉帮结派”的说辞，将禁酒令作为为巩固派系利益、边缘化政敌的工具。谁更“铁面无私”、谁更“忠诚”，成为政治竞赛的指标，导致政策失控与信任危机蔓延。

针对这种情况，中共不得不出面“灭火”。6月17日，党媒《人民网》发文指责称，在推进违规吃喝专项整治中，个别地方官员在执行时“层层加码”，把“禁止违规吃喝”简单等同于“禁止吃喝”，看似“积极作为”，实则是懒政思维下对政策的误读，是形式主义的变种。

两天后，党媒《新华社》继续发文，强调整治违规吃喝不是一阵风，并指“公职人员24小时禁酒、聚餐控制三人以内、餐费必须AA”是对整治政策的歪曲解读，必须予以警惕。文章称违规吃喝并非无伤大雅的小事小节，而是关乎党风政风的大事。表面看是一顿饭、一场酒，实质是贪腐问题的导火索。

尽管白酒行业受创、餐饮消费腰斩、地方财政吃紧，但在“政治效应优先于经济成本”逻辑下，政策调整空间变得极为有限，禁酒令在实际执行中演化为一场制度性社会治理实验，其波及范围之广、影响之深，早已超出原本的设定目标。

结语：当局陷入骑虎难下的政策困局

这场禁酒令风暴，从反腐败扩展到社会控制，从公职整顿扩大到经济管制，其逻辑与后果已脱离最初目标，暴露出中共“党管一切”治理模式的致命缺陷。运动式的层层加码导致政策失控，令本以疲弱的经济雪上加霜，引发地方财政恶化和社会信任危机。

简言之，禁酒令已成为一场对体制弹性、社会容忍度和经济承受力的压力测试。而当局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局，若继续高压推行，经济崩塌、信任断裂与体制士气崩溃将进一步加剧；若撤回禁酒令，则被视为政策失败、中央妥协，权威动摇。这回算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。

责任编辑：高义#